

潮汐文丛

这里有黄金

2400 元





24~25

这里有黄金

· 中短篇小说集 ·

广东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陈 新

扉页设计：蔡天涛

这里有黄金

·中短篇小说集·

刘心武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6.375印张2插页 124,000字

1980年3月第1版 1981年6月第3次印刷

印数 20,001—50,000册

书号 10111·1270 定价 0.60元

内 容 提 要

刘心武是我国当代有影响的中年作家之一。继《班主任》、《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等优秀作品（这些篇章已先后由香港及国外报刊转载，被译为英、法、日、世界语等多种文字）之后，于一九七九年春至一九八〇年春，又创作了一批脍炙人口的短、中篇。其中，《我爱每一片绿叶》获一九七九年全国短篇小说奖，《如意》则是他刻意创新的作品。这些作品，保持了他一贯的风格，更加深入地探索了各种社会问题。作者怀着对未来无限向往的心情，把一团团希望的火种和精神的黄金，奉献给广大读者。

这些作品去年曾由我社结集出版。现重新设计封面，并收进《潮汐文丛》，再版发行。



目 录

- 1 我爱每一片绿叶
19 快乐
26 清晨，窗外飞过一队
 白鹤……
41 这里有黄金
65 没工夫叹息
80 深谷小溪默默流
94 神秘的姑娘
107 楼梯拐弯
120 一个晚期癌症患者的
 自白
140 如意
196 后记

我爱每一片绿叶

每当春夏之际，我常常仔细观察那些躯干粗壮、枝叶扶疏的阔叶树。我发现，从同一棵树上，很难找出两片绝对相同的绿叶。

我常想，只要是绿叶，不管大的、小的，形状标准的、形状不规范的，包括被蛀出了斑眼的，它们都在完成着光合作用，滋养着树。

望着树冠上的万千绿叶，一股柔情从我心头漾起。我爱每一片绿叶。

我要介绍你认识一个人。

打这说起吧——上学期期终，我们教研组评选优秀教师，一共十六个人，按比例可以评出五名优秀教师；发言踊跃，不多一会儿，就提出来九个候选人。

我是教研组长，评选会由我主持。评议热闹过去了，会场稍显雅静。我用圆珠笔点了点记下的

提名，忽然感觉仿佛有点什么欠缺，于是抬头环顾了一下会场——啊，为什么没有人提魏锦星的名呢？

魏锦星这时正坐在角落里，他和我同岁，今年四十二了，长挑个儿，永远是个平头，皮肤称得上黝黑，眼窝明显塌陷，高颧骨，厚嘴唇，一眼能看出是个南方人。此刻他两肘支在桌上，双手十指交叉，可以清晰地听见他搬动指关节的声响。

我心里动了动。魏锦星任教二十年，数学教得呱呱叫，这两年他教的那两个班，期终考试始终名列全年级一、二名，还在《中学数学教学资料》刊上发表了两篇教学经验，把他漏掉可不应该。

“还有没有补充的？”我直朝魏锦星坐的那个位置看，启发着大家。

组里年龄最大的吴老师，仿佛有点犹豫地开口说：“我看锦星不错……”他举出了几条理由，提名魏锦星为优秀教师。

但是，他发完言，除我而外，却并没有什么人呼应。我想再发动一下，坐在我身旁的圆鼻头小余碰碰我胳膊肘说：“抓紧点吧——大伙还都有一摊子事呢！”

我就宣布散会。魏锦星头一个走出教研组，他抱着一大摞作业本，低着头，神色很不自然。看见他这样，我心里挺不是味儿。

人走得差不多了，我问平时跟我无话不谈的小余：“你们干嘛都不提魏锦星呢？”

小余耸耸肩膀说：“他？怪物！”

魏锦星的确怪。

记得我们是同一年分配到松竹街中学来的，当时学校总务处有规定，我们单身教师一律两个人住一间宿舍，可是魏锦星一到学校便向领导提出要求：“我要一个人住，房间可以比他们小一半。”

总务主任一听就火了：“什么？要搞特殊化？没门儿！”倒是党支部书记周大姐有肚量，她说：“咱们不是有间八平方米的小屋吗？就让他住吧，只要他努力工作，把课教好就行啊。”

于是魏锦星住进了那间小屋。

当时，我们十多个从各地大学分来的毕业生都住校，晚上，为备课的事也罢，为闲聊一阵也罢，不免要串串宿舍。

有天晚上，我去敲他的门。他慢悠悠地在里面说：“请进。”

我进去了。他桌上摊着书、本、资料，显然正在备课。说来也怪，他的屋子那么小，而我环顾之后，却有一种空旷的感觉。他屋里除了小床、书桌、书架和一个脸盆架外，只有一张直径不超过一尺的铁腿小圆凳，他就坐在那小圆凳上备课。其实，学校里多的是学生坐的靠背椅，他屋里却一把也不准备。

魏锦星见我进了屋，便站起来，客气地问我有什么事。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不过想和他聊聊，找不到小椅子，便去坐他的床，他掩了我袖口一下，指指小圆凳说：“这儿坐吧！”我不由得坐到了小圆凳上，这才仔细看了看他的床，啊，盖着雪白的罩单，不但一尘不染，而且平平整整，

连一丝皱折也找不出来。

奇怪的是，他自己也并不去坐床，而是在我面前以稍息姿态站着，双手背到身后，面上挂着客气的微笑，似乎在等待我提出什么问题，打算耐心地回答我。

我谈兴全无，便把备课中遇到的一个问题提了出来，他呢，俯身到书桌上，操起笔为我在纸上边画边讲。我得承认，他讲得很认真、很细心，对我确有启发，但是，讲完了这个，他便直起身来，又无话了。我当然只好告辞。

一个月以后，再没有人去敲他的门，因为大家都遭到了和我差不多的“礼遇”，小余揶揄地说，真该在他的小屋门口贴上副对子：“游人止步”，“闲人免进”，横批：“怪人居”！

魏锦星在教学上显然比我们教得更好一些，象吴老师那样的老教师听完他的课，经常当着我们的面频频赞扬，学生也反映他讲课清晰易懂，“没有一句废话”。他一样给学生补课，一样找学生谈话，只不过绝不把学生带回宿舍，他安排的地点不是教室就是教研组，到了夏天，有时干脆就在操场边、树荫下。

魏锦星那小小的宿舍渐渐显得神秘起来。不久就传出了一个秘闻，说他那书桌有三个抽屉，其中一个抽屉说空也空，说不空也不空，总之非常非常奇怪——那抽屉底上，搁着一张同底面积差不多相等的大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微笑的姑娘的大头！这秘闻发源于小余，小余自说是有一天晚上备课，因为实在得用一本习题集，而这习题集只有魏锦星才有，所以不得不去敲魏锦星的门。魏锦星爽快地把习题集借给小

余以后，便提上暖瓶，准备去打开水，他侧身让小余出了门，呆了一会儿，这才朝锅炉房而去；小余回到自家宿舍，还没坐下，就发现钢笔不见了，他想也许是拉在了魏锦星桌上，便跑去找；魏锦星打开水还没有回来，小余在桌上没找见钢笔，便顺手拉开抽屉找了一遍……当然，钢笔最后是在小余自己的书桌下面找到的，不过，魏锦星抽屉底上的大照片的事儿，从此也便暗暗地传布开了。

“真想不到，魏锦星倒走到咱们头里去了！”小余这样议论过，甚至注意过邮递员搁到传达室的信件——有没有用娟秀的字体写出“魏锦星亲启”字样的来信？但是，小余的这种多余的好奇心，慢慢地也就无法维系下去了，因为，我们住单身宿舍的其他同伴们先后都结了婚，搬出校外成了家。小余也有了女朋友，而魏锦星却依然是一个人住在那间八平方米的小屋中。

岁月，随着一节课又一节课的铃声匆匆消逝，“魏锦星是一个怪人”的判断，随着每日粉笔灰的扬起与飘落，在我们的心目中巩固下来。不过，在工作上魏锦星同我们每一个都处得很好，几乎没发生过什么值得一谈的特殊情况。

然而，除了每日的教学工作，我们还有另一种生活，就是所谓政治生活。渐渐地，政治生活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多，位置也越来越高。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教学工作似乎并不能算是革命，我们如果要革命的话，必得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开政治性会议，听别人发言、自己发言、写大字报、看大字报、揭发别人、检查自己、搜索百分之五、

保住自己在百分之九十五中的位置……渐渐地，魏锦星的日子便突出地难过起来。

记得那是在一九六四年夏天，正是“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搞得热闹的时候，教师团支部搞起了整风活动。我和魏锦星那年都已经二十八岁，参加完整风也就该办退团手续了；这箩筛般的整风整到魏锦星头上时，小余——那时候他正担任团支部宣传委员，在时代气氛的熏陶下，充满了在一切一切方面推进革命化的狂热——放了头一炮，这一炮不但把魏锦星打得面色惨白，而且，也使全场为之一惊：

“魏锦星同志的精神状态与火热的革命时代格格不入，请他向同志们交代一下自己的阴暗心理！”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魏锦星身上，记得那天他独自坐在会议室的一把破旧的沙发椅中，蜷缩着身子，沉默了足足两分钟，才笨拙地辩解道：“我没有什么……不革命的心理啊，当然，我有缺点……可是，不阴暗……”

如今回忆起来，真是难以解释。小余的那一炮明明武断之极，可是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缓和气氛，就是我自己，也在几位同志发言附合小余之后，沉不住气地表态说：“我们应当在一切方面实现革命化，堵塞一切通向修正主义的渠道；希望魏锦星同志在八小时工作之外，不再保留个人的‘自留地’！……”当时会场上一派严肃气氛，仿佛中国之是否能够防止变修，全系于魏锦星能否改变他的脾性。

这次整风很有成效，有的同志被整掉了说话喜欢艺术夸张，富于幽默感的习性（这种习性被上纲为“资产阶级自由

主义”），有些同志在“革命化”压力下戒掉了围棋、卖掉了吉他、收敛了哼唱《铡美案》的歌喉（被表扬为“交出了思想领域中的自留地”），我也被整得生怕和“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沾边，努力鞭策自己用“事事离不开阶级斗争”的眼光去看待一切……尽管我们不可避免地仍有着各自的某些非规范性的特点，但都自觉地将这种特点压缩，藏掖到最高限度。只有两个人变化不大，一个是小余，因为他的偏激和好斗似乎堪称规范，所以毋庸有所变化；另一个便是魏锦星，他背负着冷眼与误解，依然是那样勤恳地工作，依然是那样一种生活方式……

一九六六年夏天到了。突然大家都掉进了令人头晕目眩的炽热漩涡，连小余也未能例外。一时间校园里处处贴着“小将”们用最极端化的措词写成的大字报，不仅是贴在墙上、门上、讲台上、黑板上，甚至还贴在教师们的办公桌上、坐椅上乃至脊背上。

一开始，魏锦星当然绝非横扫的重点，但是，也不知应当解释为偶然还是必然，他很快地被卷到了漩涡中心。事情是这样的：

那一天，在大操场上批斗党支部书记周大姐，戴高帽子、挂黑牌子不算，还要当众剃什么“阴阳头”。我们全体教职工被集中在会场最前面，以备随时从中揪出“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押上台去陪斗。因此，个个忐忑不安，在烈日的炙烤下，热汗和冷汗浹背交流。小余低头坐在我身旁，连嘴唇都吓白了，显然，他比我们更加痛苦，因为

万万没有想到，他也一样被扫到了“右”的行列。

事情来得很突然。正当几个“小将”要给周大姐扭剃“阴阳头”时，魏锦星不声不响地离开我们的教师席，低头朝会场外走去，于是，被身着绿军服、臂戴红袖章、手持宽皮带、绿军帽下耸出两把刷子的“女兵”喝住了：

“干什么去？”

“我恶心。”

“滚回去！革命不怕死，恶心也得参加斗争！”

“我恶心。”

“你早不恶心晚不恶心，这会儿恶心是什么意思？”

“我恶心。”

“要革命的滚回去！不革命的小心狗头！”

“我恶心。”

“你到底是什么阴暗心理？你说，周溪清是不是牛鬼蛇神走资派？”

“她算什么派我弄不懂。我就知道她是人，是个好人……”

“他妈的保皇派，反动透顶！”“女兵”挥起皮带，铜头打到魏锦星脑壳上，发出一声惊动全操场的脆响。我们还来不及从新的惶悚中清醒过来，魏锦星已经被揪到了台上，满脸血污，让人扭住随周大姐一同剪了“阴阳头”，成为陪斗的头一名……

当然，他的宿舍立即遭到了查抄，没有抄出其他任何罪证，只抄出来那张大照片，于是，那张大照片很快便被粘到了大字报上，予以“示众”。我在那时才第一次看见，照片上是

个长得并不漂亮、但是青春焕发的、爽朗地笑着的姑娘。

根据一种“必然”的逻辑，魏锦星被“群众专政小组”挂上了“大流氓、坏分子”的牌子，关进了地下室。

两天以后，“群众专政小组”把魏锦星押出来劳改，给了他一把大条帚，让他去打扫操场上的公共厕所。

那一天，我作为“走资派重用的红人”，也被派到操场劳改，任务是蹲在操场边上拔草。正当我几乎被暑气弄得晕过去的关口，忽然，传来一声撕裂人心的惨嚎——那声音是我平生从未听见过的，今后也绝不忍再听。我想，倘若把一个人的肉体扔进油锅，也未必会发出那种呼叫，只有当一个人的灵魂被掷进油锅时，才会有那般的狂啸……

我抬头朝发出声音的地方看去，啊，原来是魏锦星。他发现了粘在大字报上“示众”的大照片，象头狮子般地扑了过去——当然，他立即被身边的押解者扭住了，于是，两个人纠作一团，不用说，很快就有另外几个“群众专政组”组员去支援战友，于是，两分钟以后，魏锦星便被踢打着又带回了地下室。

太阳静静地照耀着白晃晃的操场。我受了这个场面的刺激，眼前似乎旋转着一个灼目的万花筒，终于仰面晕倒在操场上……

众所周知，后来学校里又发生了许许多多难以想象而居然出现的事情。我只想告诉你，有一天，那是在包括我和魏锦星在内的大多数教师终于被进驻的工宣队解放以后，小余

忽然很激动地跑来对我说：“嘿，你说顽固不顽固——魏锦星的抽屜里，又有张大照片了，还是原来的模样——肯定是他用旧底片新放大的……”这回，小余没谈他是怎么发现的，但是，我相信这是真的。

我本想对小余说：“大照片就大照片吧，这是人家个人的事……”可是终于又咽了回去。小余那时候又渐渐顺利起来。他在红卫兵、工作组、“造反派”、工宣队几朝治下，不断地重复着这样的“三部曲”：先是带头“斗私批修”站过去，接着当一阵“路线斗争”的积极分子；随后又“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看来我们的政治生活很需要小余这样的“标准群众”，也难怪小余对魏锦星这号难以就范的格涩人物不予谅解……

终于到了这一天，“四人帮”垮台了。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本身就是革命，我们每日的教学工作也就是革命活动，这个浅显的道理被肯定以后，我们渐渐地如梦方醒。大家都很高兴，小余可以不必再重复扮演那令他人和自己都腻烦的“三部曲”，魏锦星脸上也出现了难得的笑容。

在整顿教学秩序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战斗中，魏锦星作为我们教研组的一员，表现得非常出色。

那是一九七七年春天，有个初三年级的团员，是个头发扎扎乎乎象个刺猬的男孩子，他社会工作很积极，学习成绩却不行，尤其是数学，他先是小考连续不及格，后来爽性作业也不交。小余是他的任课教师，把他找到教研组来谈话，问他为什么不交作业。

那同学自知理亏，只是反复强调，“我不会做啊！”

小余板着面孔下命令：“你坐在这儿给我补出来，补完了再干别的去！”

那同学摊开作业本，看了看题，叹口气说：“太难啦，这题我不会做啊！”

小余气得不行：“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作，哪儿不会你提出来，我给你讲！”

那同学眉毛结成两团疙瘩，喏喏喏硬是下不去笔。

我们好几个老师都走过去批评他。

这时，魏锦星不声不响地出现在他的身旁。只见他俯身拍拍那同学的肩膀，从胸兜中掏出一张写有练习题的卡片，送到那同学眼前，亲切地问：“那么，这样的题你总能作吧？”

那同学接过卡片，看了一下，脸更红了，头也不抬地说：“还是不会。讲这号题的时候，我就听不大懂了……”

小余气得直咬牙，魏锦星却又麻利地从胸兜中掏出另一张习题卡片，递过去问：“那么，这样的题呢？”

那同学接过去，啃了啃钢笔杆，点下头说：“倒能试试，可没准也做不出来。”

大家都还没反应过来，魏锦星竟又从胸兜中掏出第三张习题卡片递了过去，那同学接过一看，松了口气：“这号题我会作。我就是打这以后糊涂起来的！”

魏锦星拍拍他的肩膀说：“那就请从这几道题作起吧。”

同学开始作题了，魏锦星从胸兜里掏出剩下的几张卡片，一并送到小余眼前，解释似地说：“学生有时候说不清自己学

习上拉下了多远，我准备了这样一叠写着深浅程度不同的习题，能把他们拉下的距离测出来。借给你参考吧，请后天还给我。”

说完，不等小余道谢，竟又不声不响地消失了。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很佩服魏锦星。但是，也许是物理学上的“惯性作用”作祟吧，背地里大家仍旧认为他是一个怪人。

一九七八年春天到了。迎春花谢去了满枝黄瓣，窜出了碧绿的叶片。我多年不住校以后，又重新回到学校，住进了宿舍。因为我和爱人、儿子组成的小家庭离学校太远，而在这个春天里我又有着那么旺盛的工作热情，因此，我决心每周只回家两次，其余的晚上都在宿舍里悉心备课。我回校住了几天以后，才又注意到魏锦星的那间宿舍，依然是素净的白布窗帘，依然是“闲人免进”式的气氛。只是窗外的杨树粗了许多，晚风一过，叶片的摩擦声更响，使人想起流动的山涧，从而进一步联想到逝去的岁月，而生出万千的思绪。

我轻轻走到那株杨树前，伸手摩挲着树皮，仰头望去，星星从叶隙中闪烁出神秘的光芒。我想，这真是一件怪事，十多年来，宇宙中发生过多少巨变，就在我们生活过的这片大地上，曾经席卷过多么惊心动魄的政治飓风，然而这间八平方米的小屋里，却仍旧保持着可以想见的特有状况。

我忽然觉得，魏锦星多么值得怜悯。我们毕竟有了个小家庭，尽管房间很小，生活也艰辛，但有老婆儿子，得享天